

缅怀孙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早期革命活动

李希泌 贺敬美

今年7月1日，我国恢复行使香港地区主权，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大事。这件事标志着我们国家强大、统一和民族振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香港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中国近代史上，香港沉积着血与火的纪录，同时也记载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开展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于一百五十六年前（1841年1月26日）丧失香港主权，于九十九年前（1898年6月9日）又被强行“租借”拓展香港“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附近200多个岛屿，即现称的‘新界’”^①。而在中国丧失香港主权40年后，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即开始了早期革命活动。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逸仙。1897年到日本避难后，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由此得来。孙中山先生于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南部香山县（现名中山县）翠亨村，距香港仅50英里。当时孙中山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孙达成在16岁时漂流澳门当鞋匠，32岁才回村结婚。他的哥哥孙眉15岁就给地主扛活，后来离家去檀香山谋生，经营畜牧业。孙中山从小没有鞋穿，很难吃上米饭，以蕃薯为主要食粮。6岁时就和姐姐上山砍柴，10岁才进私塾读书。孙中山自幼目睹农村贫困和不合理的制度，又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英雄故事的鼓舞，17岁那年与伙伴破

坏了村庙“北极帝君”的塑像，引起村中豪绅、地主纷纷向孙达成兴师问罪，孙中山也被迫逃往香港。1883年底他17岁时进入香港拔萃书院（英国基督教会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读书，后又转入香港中央书院（港英当局办的中等学校）继续读书。他哥哥孙眉得知他破坏神像，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后，非常生气，催促他于1884年11月赴檀香山。孙中山在檀香山不到一年，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私自于1885年8月又回到中央书院学习。结业后，进广州博济医院（今中山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学习，但感到广州这地方发表政治言论很受束缚，翌年转学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学习，直到毕业。他后来说，香港不仅是他的“知识诞生地”，而且是他的“思想发源地”^②。这说明他的学习生活与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他孜孜不息地学习，学习成绩一贯优秀，外号“通天晓”。在中学和大学学习时，历年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1892年7月他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于西医书院，接受了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J. Cantlie）颁发的全院“第1名毕业执照”，并且获得了医科硕士学位。

西医书院采用英国医科五年学制，这使他有时间广泛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华盛顿、林肯的传略。他从这些书中探求救国真理并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文明，但同时攻读中文，得到王孟琴、陈仲尧老师的辅导。广涉博取，中外兼蓄。“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并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③。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国内外人民反帝、反封建浪潮的积极影响。例如他在香港中央书院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浪潮波及香港。香港爱国工人、

市民举行大规模声援活动，进而抵制修理法国战舰，迫使港英当局释放被捕香港群众，抚恤被打死者家属，“听华民不装法货”。斗争胜利给年轻的孙中山很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④。

孙中山学生时代的革命活动，虽然还受到当时改良主义的影响，但这些革命活动对孙中山以后逐步形成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探路作用。

1891年前后，他撰文阐述中国革命政治局势，其中的一篇关于发展农业的文章发表在上海《万国公报》上，主张学习西方，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⑤。他还利用假期从事发展农业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求得真知。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常住在同乡杨鹤龄在香港歌赋街开设的杨耀记商号店里。店内独辟一处，专供他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聚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予与陈、尤、杨三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⑥。其中尤列是，广东顺德人，少时拜顺德名儒陆南朗为师，某日读《易经》至“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一句时，老师击尤列头说：“我要你毕生记此一句。”尤列选择到香港学习，其动机和孙中山相同。孙中山对尤列说：“……今幸相遇，便是同志”，二人“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⑦。当时香港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他们的革命言行尚不理解，往往认为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但他们置之不顾，仍然对外扩大联系，响应者有在上海的郑士良，在安徽的陆皓东等。

孙中山先生结束学生生活开始行医后，即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途。他采用由南向北的战略进行武装革命，计划在南方建立政

权，而由于香港的位置和可利用的条件，革命党人可避开清廷直接查捕，以经商为掩护，从事秘密活动，交通、联络比较方便，所以把香港作为主要基地。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回香港与陆皓东、尤列、杨鹤龄、陈少白、郑士良建立了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是近代史革命派的第一个指挥部。地址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兴中会在港吸收1892年成立的新学团体——辅仁文社的成员入会，还联络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反清的会党人士，壮大实力，修订了《章程》。筹划袭取广州时用青天白日军旗。入会誓词是：“……驱除达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⑧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港英当局下令封闭了乾亨行，孙中山设法借西营盘杏花楼酒家秘密活动，得到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并得到在香港的外国记者《德臣西报》主笔黎德（T.H.Reid）、《士蔑西报》主笔邓勤（C.Duncan）的支持。兴中会在准备1895年10月发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不幸事机不密，从香港秘密运送的枪械被海关查出扣留，港英当局也将兴中会活动情况向清两广总督告密。这次举事被镇压了。陆皓东等牺牲，40余人被捕入狱。清廷下令通缉孙中山，1896年港英政府也向孙中山下了驱逐令。

孙中山向港英辅政司洛克写信，以理晓示，争取他的同情。洛克于1897年10月4日复信孙中山：“顷接未注明日期之来函，兹奉命函复先生如下：本政府不愿容许任何人将英属香港殖民地作为避难所，阴谋筹划危害一个友好临国的行动。鉴于先生参加来函婉转称之为‘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这类活动，如果你对1896年的驱逐令置之不顾，足履本殖民地，定会将你逮捕。谨此奉复。”^⑨

清廷通过港英政府正要对孙中山采取行动时，孙中山离港赴往日本等处避难。从此孙中山未登陆于香港，也未在香港公开露面，只在香港海面轮船上和党人会晤，进行部署。

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借重香港作为基地，在这里打算争取港英政府，或者英国、日本力量的支持，甚至派人与清廷直隶总督、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商谈“合作”，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但都宣告失败。而港英政府对于封建没落的满清政府和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取舍态度上，十分明确。世界列强都不可能帮助孙中山，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强国的道路，这是根本利益之所在的缘故。以后，孙中山先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从失败中得到教训，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中，由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发动了1911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然而旋即就被世界列强支持下的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政权，恢复了帝制，辛亥革命失败。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上，吸取经验教训，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强大，民族的振兴，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自香港被英国以武力占领起，中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而这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行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历经曲折，英勇奋斗，孙中山是他们中最伟大的代表之一。孙中山先生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进步，尤其在晚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帮助下，采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广泛爱国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功绩永垂青史。

祖国将以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大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回归后

的香港将更加稳定、繁荣。中英达成香港回归协议以来，香港的中资机构迅速崛起，目前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驻港中资企业约1600家，涉及贸易、金融、保险、运输、仓储、旅游等方面，是香港的重要经济成份之一。内地一直以优惠的价格提供香港所需物资，今后的香港，仍离不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支持。祖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的振兴，孙中山先生当可含笑于九泉了。

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缅怀先哲革命伟业，激奋之情，曷维能已！曷维能已！

注：

① 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正式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在此之前，英国即使用武力占领了香港，于1841年1月26日宣布香港被占领，在维多利亚港建兵营。于1898年6月9日英国迫使清政府复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扩大“租借”地。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香港概览》2—3页。

② 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孙中山研究·第一辑》：陈华新《香港是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发源地》（169页）

③ 见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版尚明轩著《孙中山传》21页。

④ 同上16页。

⑤ 同上23页。

⑥ 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孙中山选集》上卷192—193页。

⑦ 同②。

⑧ 同③33页。

⑨ 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民国掌故》137—139页。《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4月版）50页亦有此记载，翻译文字稍有出入。

作者工作单位：本刊编辑部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